

藤编匠：妙手编织精美耐用的家什

■晚报记者 朱保彰 文/图

藤编,就是用藤类植物茎秆的表皮和芯为原料编织工艺品和实用品。藤编匠就是利用藤子编织各种器皿和家具的匠人。藤编技艺有很悠久的历史,三国时期就有了藤编工具的应用。藤编因其质地坚韧、色泽光滑,手感平滑,弹性极佳,置于寒室不觉其奢,布于华堂不觉其陋。因此藤编匠在过去是个很吃香的行当,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,手工藤编工艺开始走下坡路,以至于到了今天,在城乡居室内已很难见到藤编器具,藤编匠也越来越稀少了。

藤编是种精湛的技艺

在记者少年时期的记忆中,藤椅在农村还是个比较奢侈的物件。那时候,农村青年男女结婚时置办一对藤椅是必不可少的,如果谁家购置了一套藤椅沙发,必定会引起十里八村人的羡慕。毕竟那时候生活物资匮乏,能从长条木凳、木椅升级为藤椅、藤子沙发实在是一种物质的享受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,因此,能拥有一把藤椅,曾经是那时老百姓的最大梦想。

记者在寻找藤编匠的过程中,也着实费了一番周折,终于在沈丘县白集镇找到了藤编匠张国用。不过,由于各种原因,年近古稀的他已经不再从事藤编工作了。然而,当他谈起自己的藤编行当时,却娓娓道来,如数家珍。

张国用说,藤编工艺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技艺,一靠有悟性,

二靠有耐心。一把藤椅需要一天多时间才能完成,除了吃饭外,大多数时间都是坐下来,静下心来经纬交错地编织,一般没有耐心的人是很难坚守下去的。张国用介绍说,藤编工艺靠的是图形和工艺上的创新,光按照老样式是编不出人们喜爱的东西的。比如说,人们常坐的藤椅,在改革开放后,是清一色的黄色藤子,看上去很亮丽、很炫目。自己在编织的过程中,在扶手上用红色藤子编织出红“囍”字、“福”字、“寿”字等文字,非常受顾客的喜爱,因此销路也很广。别人编织的藤椅发愁卖不掉,而张国用所创新的藤椅,则需要提前预订。

张国用说,所谓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”说的就是,作为匠人不要光照搬祖上流传下的工艺,自己要有创新,才能有前景。

藤编是种掏苦力的活计

张国用说,藤编在我国约有 1000 多个花色品种,主要有藤筐、藤席、藤织件、藤家具等 10 大类。藤编具有轻巧、凉爽、耐用等特点。比如藤席,分原色、间色两大类,有床席、方席、枕席、大席以及沙发座套、手提篮等。藤子家具,则有桌、椅、沙发、凳、床、柜、茶几、箱、屏风等,其中藤椅产量最大。藤椅又有龙凤椅、孔雀椅、梅花椅、兰花椅、餐椅等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,流行用粗大藤条直接编织成大型藤家具,如餐椅、桌、屏风、橱柜等,风格古朴粗犷,富有天然情趣和时代气息,因此在农村的婚嫁市场很受欢迎。藤织件,包括日用器具、玩具、装饰品等,如手提篮、罐、盒、灯座、镜架、书架、茶杯套、花盆套及青蛙、熊猫、象等玩具。

谈起藤编用具,张国用介绍说,藤编一般经过打藤(削去藤上的节疤)、拣藤、洗藤、晒藤、拗藤、拉藤(刨藤)、削藤、漂白、染

色、编织、上油漆等十几道工序。藤编主要以藤枝、藤芯或竹为骨架,然后用藤皮或幼嫩的藤芯编织而成,充分发挥藤条柔软、不易折断的特点。在色彩上,大多采用原藤的浅黄色,或加工、漂白为白色、象牙色,显得柔和典雅,有些则配以咖啡色、棕色等。藤家具以粗大的藤条为骨架,经钉架,再用藤皮、藤芯编织而成,最后上油漆或上色。因此,编织藤子用品,小件的需要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,大件的家具则需要三五天或十天半月。是个既费眼力,又费体力的活计。藤编匠人最后都要落上腰酸腿疼和过早花眼的“职业病”。

说起以后的手工藤编用品的前景时,张国用直摇头。他说这个传了多少朝代的手工技艺,到现在都被机械化给代替了,以后恐怕没有人再用手工去做这些“掏力不讨好”的手工艺品了。



藤条筐



老式藤椅



藤编家具

胡适人生中的尴尬事

■史飞翔

人生少不了会遇到尴尬事,往往需要有一种豁达的心态去面对。

胡适一生中就遭遇过不少尴尬的事。1934 年秋的一天,北京大学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。那天天气晴朗,出席的人非常多。大礼堂站满了人,外面也站了很多。会议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。

蒋梦麟首先讲了一段法国“最后一课”的故事,主要目的是劝学生安心读书,不要搅和国事。这种论调很不合血气方刚、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年轻学生的口味,但学生们还是静静地听着,一边克制忍耐,一边想看看校长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。

不一会儿,蒋梦麟讲完了。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上台讲演,这下捅了马蜂窝。一时间,嘘声四起,伴以巨大的喧哗声,经久不息。胡适演讲得极其艰难,大家根本听不清楚。

据当时的北大学生、坐在讲台前的李祖荫先生回忆: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,他说一句,学生嘘一阵。我只听清“打仗三日就亡国”一句,余多听不清楚。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,围灰绒围巾,双手握着,左右急剧飞舞,想压下学生的喧嚣,可是学生们依然故我。胡适气得发抖,说:“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,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,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。”此言一出,更是火上浇油,谴责声、叫骂声越来越厉害,结果胡

适不得不尴尬地从讲台上下来。从此以后,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的公开场合露面了(李祖荫《胡适受窘北大礼堂》)。

据岳南的《南渡北归》记载,胡适在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期间,常在所里举行研究报告会。通常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,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。一次,一位姓韩的研究生,提出了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问题的研究报告,宣读完之后,胡适第一个作点评。

胡适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,讲到中途,韩君突然打断胡适的话头说:“胡先生,你再说下去了,你越说越外行了。”随即将胡适话中说错了的地方一一指出来。胡适的脸顿时红得像经了霜的柿子一样,羞愧难当。

这要是换成今天的一些导师,一定会恼羞成怒,将学生大骂一通,甚至将分数打为不及格。但是,胡适没有。胡适毫不动气,他立刻停止点评,请韩君的导师、佛教史权威汤用彤先生对韩君的报告继续加以评点。

报告会结束时,胡适说:“以后举行报告,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,以便略作准备,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!”胡适并未因此怀恨这个学生,反而对他刮目相看,后来在学习、就业等方面多次帮助他。

胡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中说,胡适“还有个洋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”:“珍珠港事变”前,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院议员。胡适曾与此君有一面之缘,为表庆贺乃柬请其来中国大使馆晚餐。谁知这位议员在



胡适先生(图片源自台北胡适纪念馆)

匆忙赴宴途中竟忘掉了主人的名字,向计程车司机询问也不知。好在吃饭时满口“大使”、“阁下”相称也足够应付。席终宾主尽欢,胡适送客,礼节性地邀请史密斯来日到中国旅游。“中国我是一定要去看光的!”史密斯肯定地说,“到贵国观光,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。大使先生,胡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?”胡适闻此,笑颜大开,答道:“胡适此刻就站在你的对面啊!”二人相拥大笑。

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运动,也曾多次遭遇过令他尴尬的事。1919 年,林纾在小说《荆生》中写了三个书生,其中一个归自美洲的狄莫,能哲学,便是隐指胡适。在另一篇小说《妖梦》中,林纾写阴曹地府一所学校中有三个“鬼中之杰出者”,其中副教务长秦二世,

又是指胡适。两篇小说,用影射的形式,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。胡适虽遭遇尴尬,但心存宽厚。1924 年林纾去世,胡适在《晨报》发表文章,对林纾给予公允之论。

国学大师黄侃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更是嗤之以鼻,基于此,他对胡适“挤兑”得最厉害,可谓极尽挖苦。但胡适从来都是一笑了之。

还有一次,胡适想刻一枚“胡适之印”的名章,便请京城一位篆刻家刻印。这位篆刻家坚决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,遂当面质问:“胡博士提倡白话文,怎么也用‘之’乎者也”的‘之’字呢。那可不相称吧?”胡适未作答,含笑告辞。三天后,胡适收到印章,一看,上刻“胡适的印”四个字。遇此尴尬,胡适也只能苦笑一下。